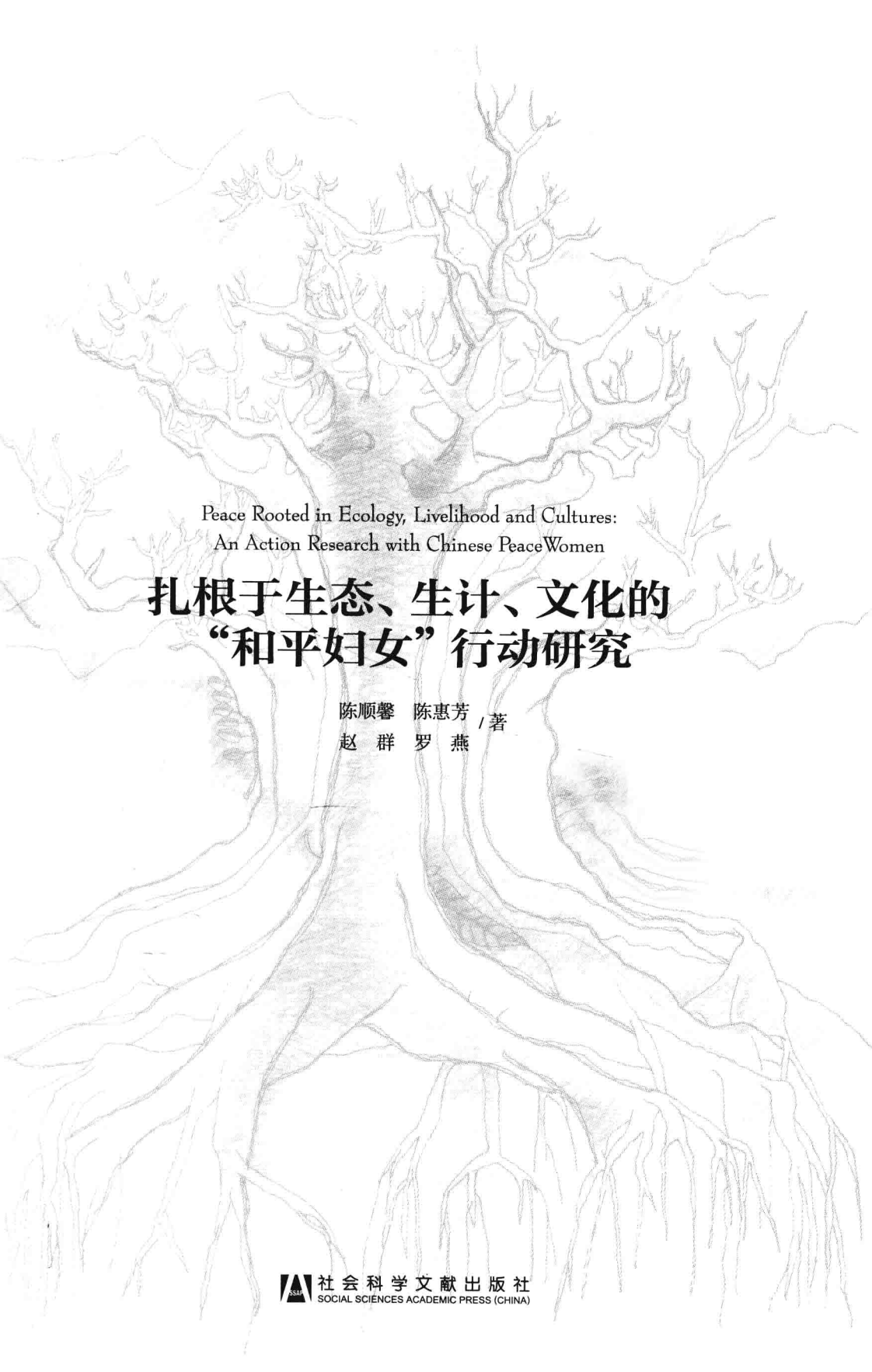


Peace Rooted in Ecology, Livelihood and Cultures:
An Action Research with Chinese Peace Women

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 “和平妇女”行动研究

陈顺馨 陈惠芳 / 著
赵群 罗燕





Peace Rooted in Ecology, Livelihood and Cultures:
An Action Research with Chinese Peace Women

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 “和平妇女”行动研究

陈顺馨 陈惠芳 / 著
赵群 罗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
陈顺馨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97-5328-6

I. ①扎… II. ①陈… III. ①妇女运动-研究-中国
IV. ①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8708 号



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

著 者 / 陈顺馨 陈惠芳 赵 群 罗 燕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杨桂凤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责任校对 / 王建龙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328-6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26.25

字 数 / 464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总论、行动研究方法与研究总结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3
第二章	行动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	28
第三章	研究总结	122

第二编 “和平妇女”行动计划与实践案例分析

第四章	山西 王树霞、段锁兰与妇女协会、合作社： 生态耕作转型与知识生产	145
第五章	云南 优内与妇女小组： 在市场经济与现代化暴力中寻找出路	181
第六章	江西 王华连与妇女鼓队： 我鼓、我歌、社区、互动	216
第七章	香港 王爱华、杨宝熙、陆少琼：社区厨房 与人地情的温柔	269
第八章	台湾 徐兰香：以护土养生抵抗资本主义	295
第九章	四川 高清蓉：以建立城乡共同体保护地球	342
第十章	内蒙古 殷玉珍：种树治沙与发展的拉力	374
后 记		411

第一编

总论、行动研究方法与研究总结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第一节 “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大陆、香港、台湾和平妇女行动研究”计划的缘起

长期以来，和平这个议题，如果缺乏国与国之间或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或军事行动（战争）作为对应，似乎很难指出其在没有出现战争的地区中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过，近十年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在这十年内多次颁发给在生态环境、地球暖化、贫穷、人权、民主等问题上做出贡献的人士，^① 让和平概念的外延逐渐扩大，还因为不少和平运动推动者和研究者，在议题的设定上包纳更多危害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之余，深入包括妇女在内的边缘群体，包括 2003 年发起一个国际性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运动的“全球和平妇女”组织。^② 揭示和探讨

① 在 2003 ~ 2012 年间，因关注环境问题而获奖的有 2004 年的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2007 年的阿尔·戈尔（Al Gore）及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因关注贫穷问题而获奖的有 2006 年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2011 年有三位妇女因以非暴力抗争维护妇女和儿童参与和平建设的权利而获奖，她们是利比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莱伊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以及也门的塔瓦库·卡曼（Tawakel Karman）。

②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运动由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文高博士发起。她组织了一个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05），从全球提名 1000 名妇女，以集体名义争评和平奖，目的是改变人们对和平的认知，包括和平工作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不是个别精英（大多是男人）的事；维护日常生活中的人权、公义、平等、尊重、安全、互助；等等。其中，女人和（转下页注）

她们维持和平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这场运动，像一阵旋风，把全球约 150 个国家的妇女卷入其中。运动的发起人、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文高博士（Dr. Ruth-Gaby Vermot-Mangold）说：“和平不可能是个人可以达到的，因此妇女走在一起，结成网络、团体和联盟。从每天的工作，她们看到，和平并非仅仅是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消灭……而是获得安然的日常生活。”^①

香港岭南大学之所以能与这场运动结缘，是因为筹组运动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任教的刘健芝，她承担的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蒙古国的提名工作。就在这样的机缘牵动下，她与香港的陈顺馨和陈惠芳、北京的戴锦华和台湾的钟秀梅组成了一个跨境的工作团队^②，以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为基地，开展了中国地区的公开提名工作，并评选了 108 名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妇女进入千人名单。这些妇女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工作岗位，采取不同工作策略或直面可见的暴力（如家庭暴力、社会权益不受保护等），或面对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隐性暴力（如生态破坏、生计不保等）和文化暴力（如歧视、排斥、区隔、社区解体、价值崩溃等），展示多姿多彩的和平。^③ 尽管全球千名“和平妇女”最终没有获奖，提名过程与相关的宣传、教育和出版活动^④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回响，更多人因此看到了妇女（特别是基层妇女）在消除日常生活暴力方面所做的贡献。

跟“全球和平妇女”一样，工作团队在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活动结束后，觉得需要继续推动“和平妇女”的工作。一方面，我们与 108 名大陆、香港、

（接上页注②）妇女团体做出了非常多却不为人知的贡献。2005 年提名工作完成后，协会改组为“全球和平妇女”（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会址在瑞士。详情参看协会出版的 Association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05. *1000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 Zurich: SCAIO 和“全球和平妇女”组织的网页：www.1000peacewomen.org。

① 陈顺馨主编《多彩的和平——108 名妇女的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 3 页。

② 陈顺馨也是任教于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陈惠芳是农村发展、艺术和翻译工作者，戴锦华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钟秀梅则任教于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

③ 这 108 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和平妇女”的详尽故事，参见陈顺馨主编的《多彩的和平——108 名妇女的故事》。

④ 例如“全球和平妇女”除了出版 *1000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 外，还制作了 1000 名妇女的展览资料，供各地参与提名的组织做流动巡回展览之用，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曾经在内地和香港举办数次这样的展览。香港方面，除了出版《多彩的和平——108 名妇女的故事》一书外，还制作纪录片《不可能之可能：和平、妇女、诺贝尔奖》（岭南大学，2007）和《让世界看见》（岭南大学，2007）。详情可参看网站 www.1000peacewomenhk.org（香港）及 www.1000peacewomen-china.org（内地）。

台湾的“和平妇女”保持联系，并组织活动和出版教育性资料；^① 另一方面，我们策划开展一项更有焦点和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能强化“和平扎根于日常生活”这一观念，并通过分析大陆、香港、台湾的“和平妇女”的行动经验、克服困难的方法以及生产知识的方式，思考和建构可持续和平的实践模式。我们也希望将研究成果与其他和平实践者（包括行动者、研究者和教育者）分享，让学术行为能成为推动日常生活和平进程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工作团队邀请了熟悉“和平妇女”的大陆学者赵群加入^②，组成一个新的研究团队，仍然以岭南大学为基地，在2008~2011年实施了这个名为“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大陆、香港、台湾和平妇女行动研究”的计划。^③

我们（指研究团队）为研究设定的两个目标如下。

（1）通过探究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和平妇女”在生态、生计与文化等方面所面对的暴力，以及她们处理或回应这些暴力的行动的经验、策略和困难，强化和平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个观念。所谓生态、生计与文化方面的暴力，包括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人地分离、城乡分隔、生计不保、价值崩溃、社区解体、人际关系疏离等，而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香港，这些暴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当下社会所崇尚的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也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大陆、香港和台湾当然存在差异，但我们希望从这些差异中看到和平工作不同的可能性。

（2）通过对个别“和平妇女”细致的案例研究和对她们之间的互动交流的观察与分析，总结过程中相关的知识是如何生产、积累和传递的。知识的生产、积累和传递对于探讨和平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为和平是一个需要不断通过行动转变我们对事物的既定认知（包括理念、角度、技术等方面）、价值观和关系的过程，而这也是可持续性的重要内涵。此外，认知、价值观与关系的转化是具有性别特征的，例如拥有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知识的农村妇女，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推动工作，并通过怎样的方式交流与传递知识，可能跟她们在家

①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仍然担任“全球和平妇女”国际委员的刘健芝负责，包括成立“全球和平妇女”北京办事处，继续进行国内外的联系与交流。

② 赵群任职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妇女与发展问题，曾经参与“和平妇女”2005年底在昆明的聚会。

③ 这方面的工作则主要由陈顺馨负责，包括书写研究计划方案、申请研究基金、协调研究团队推动整个研究等。研究团队成员与曾经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研究助理和个别协作者名单，见本章附录（二）。

庭、社区与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建立的人际网络息息相关。因此，知识生产与性别是我们这项可持续和平研究的“文化”面向的组成部分。

我们之所以选择生态作为落实这项研究工作的首个重点，是因为看到生态危机已经严重危害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尤甚；环境议题在 108 名中国“和平妇女”的关怀和工作中占高比例是最好的佐证。^①在众多关怀生态议题的妇女中，我们主要选择邀请在农耕、食物和生活这个重要环节上做出和平行动的妇女参与这个研究计划，有些是以耕种维持生计的，有些以不同方式促进城乡互动，有些则是改善社区生活的。来自 11 个点的妇女，部分以个人身份参与，部分代表其所属的组织；其中 5 个点的妇女来自原有的 108 人名单，包括内蒙古的殷玉珍、宁夏的杨海澜、山西的王树霞、江西的王华连和台湾的徐兰香，其余的人是通过不同途径新邀请的，包括云南的优内、四川的高清蓉、香港的陆少琼和王爱华、香港的杨宝熙和“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简称“主妇联盟”）代表，全部统称“和平妇女”。^②

这些“和平妇女”和其所属的团体的生态关怀，大多跟她们的生计紧密相联，因此，研究希望进一步深入探讨生态与生计之间的关系，即妇女在为改善生态环境采取行动时，有什么生计上的考量？有什么张力或拉扯？此外，在进行环境保护工作时，无论工作跟生计是否直接相关，妇女都是身处家庭、所属组织、社区以至整体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种种关系与价值体系中。行动过程中，这些关系与价值是否因着妇女的行动而有所变化？妇女又如何处理这些“文化”因素对行动可能构成的障碍？这些问题也会在这项研究中进行探究。

总的来说，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妇女扎根于生态、生计与文化的行动，对应或试图消除的是怎样的日常生活暴力（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与危机？

（2）妇女在什么条件下和使用什么策略推动生态平衡农业、城乡互动和文化建设的实践？这些条件和策略对于和平的可持续性具有什么含义？

（3）生态、生计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哪里？就建立可持续和平的愿景而言，妇女的行动展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与困难？

（4）妇女的行动经验、策略与行动过程，体现了怎样的性别特征和地域差异？

① 在 108 名中国“和平妇女”中，有 40 多位的工作是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居众多议题之冠。详情参见陈顺馨主编《多彩的和平——108 名妇女的故事》。

② 陈来红和陈秀枝曾分别代表“台湾主妇联盟”参与这个研究计划在银川和香港举行的工作坊。当时被邀参与行动研究计划的“和平妇女”的所在地和工作内容，见本章附录（一）。

（5）研究过程本身是否构成一种和平行动？

在这项研究中，“可持续和平”指的是和平行动或进程可以持续下去的条件，而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具体探索的是和平建立在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生计和可持续文化（包括社区生活文化、关系与价值，知识生产，性别主体性等内涵）基础上的条件。可持续生态我们理解为有机的、平衡的和循环的，即顺其自然的系统与过程；可持续生计为以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平衡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和公平的流通，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源维持生命和生活；可持续文化为包含对人、土地和传统的爱护与尊重，重新建立被切割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崩溃的价值，促进性别平等，生产（包含积累和流通）横向的、富创意的和解放性的知识，等等。

第二节 行动研究：理论与方法

我们主要采用“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或“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这一“方法”来设计研究活动，一方面是因为行动是“和平妇女”的共同点，也是和平能持续下去的关键；另一方面是因为认同研究是行动的一部分，通过鼓励妇女参与对自己的和平行动的研究（观察、记录、讨论、分析和书写），让她们认识到这是和平行动的组成部分，她们和研究团队（一般理解的专业研究人员）均是这项研究的主体，没有她们的参与，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因此大家是伙伴关系。

在邀请“和平妇女”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候，我们用了非学术的朴素语言，简单介绍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概念，以及为什么适合被应用于可持续和平的研究：

行动研究是一个从经验中学习的过程，是实践、反思及学习三者的辩证互动。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或策略，参与式行动研究不会把研究对象视为被动的，而是积极参与整个研究计划，包括行动的设计、执行、讨论、评估以至发表报告，均与专业研究员一起推进。换句话说，研究与行动分不开，研究者就是行动者，行动者也是研究者，大家相互学习及分工合作本身，也是和平的过程。^①

……和平需要我们行动起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社会制度及日常

① “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计划邀请信，2008年4月21日。

生活的态度和习惯，才能持续。

行动需要我们不断对自己的工作及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并通过学习交流，更新我们的思维、价值观、对事物的认识和工作方式，扩大视野，调整目标，创造新的可能性，才能持续。

研究，就是总结和反思经验，并进行学习交流、更新、调整和创造的行动过程，让我们原来有价值的和平工作能够持续下去。

换句话说，研究就是行动的一部分，行动也是研究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行动者和研究者。在这个研究中，农村的生产者和城市社区的实践者，跟在学术、研究和发展机构工作的，都是研究的主体：前者自己研究自己，后者也不同程度参与其中，扮演协作、辅助、观察和记录的角色，最后，将大家的行动研究经验进行总结及分析，变成有用的材料，供其他人分享及参考。这便是行动研究的含义。

总的来说，行动是和平研究的中介。^①

行动研究的学术文献，对于这种方法背后的理念和理论基础的讨论，可以说支持了我们的选择，现简介如下。

一 行动研究的前提

（一）行动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途径而不是纯粹的研究方法

根据格林伍德和列文的研究^②，行动研究是促进社会向民主、开放和公正变革的途径。虽然属于社会研究的一种，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主流社会研究意义上的“方法”，即不可以依循专业研究者定下的问题、程序和步骤推进研究就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而是一个以具体解决问题或推动改变为导向，由面对问题的人或变革推动者共同参与行动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是长线的、延续性的，因为问题一般存在已久，变革也需时，而有时限定的行动研究“计划”（project），可能只是这过程中的一站或一个阶段。时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而行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解决问题时需要处理的一些本地语境（local context），同样不是行动者能够控制的，加上过程的推进，也视乎资源、力量、技术和其他元素的投放情

① 《银川工作坊行动日志》，行动研究工作坊（一），银川，2008年8月17~23日。

②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2007.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Social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Thousand Oaks, London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况,所以能否解决具体的问题,并不是衡量研究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过程中是否展示了民主的力量和行动者的主体性,共生了新的知识,创造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或条件,也是重要的指标。这是行动研究的基本认识。

我们的“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最大的关注点是和平工作如何能持续下去。那些我们称之为“和平”的追求,基本上呼应格林伍德和列文所提出的“社会变革”目标。正如“和平”需要落实在不同的实践里,“社会变革”这些空泛的理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和背景的行动研究实践中,曾分别落实在不同的目标中,如恢复“二战”后西方经济的工业民主〔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①和英国塔维斯塔克人际关系研究所(The 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70~90年代促进欧美等地企业发展的参与式管理〔如挪威工业民主计划(Norwegian Industrial Democracy Project)〕,70年代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已发展国家弱势群体的组织力量和保证公民权(如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②、哥伦比亚社会学家奥兰多·法尔·博尔达^③、美国教育家迈尔斯·霍顿^④、Centre for Community Partnerships),以至“农民参与需要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70年代学术界促进参与式研究,80年代以来促进教育的参与性和开放性学习与促进性别、阶级平等。

我们理解的“和平”是一个针对不同形式的暴力而做出变革的过程,而无论是针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社会制度还是日常生活中个人的态度、习惯或价值(文化)而做出的变革,都需要行动,所以,“行动研究”这一手段可以说是我们必然的选择之一。导致生态环境、生计和文化破坏的暴力,是非常复杂的,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体制和主流发展主义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参与行动研究的11个妇女和组织点,来自大陆、香港、台湾:有些身处北方的

①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生平及学说见Smith, Mark K. 2001. “Kurt Lewin: Groups,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Action Research”, on Infed.org, <http://infed.org/mobi/kurt-lewin-groups-experiential-learning-and-action-research/>, 浏览日期:2013年9月27日。

② 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生平见施宜煌《一位批判邂逅者的生命图像——Paulo Freire》,《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学报》,2011年第42卷第2期,第219~246页。见<http://utaipen.lib.utaipen.edu.tw/dspace/retrieve/2035/42-2-8.pdf>, 浏览日期:2013年9月27日。

③ 奥兰多·法尔·博尔达(Orlando Fals Borda)生平见“Orlando Fals Borda: Sociologist and Activist Who Defined Peasant Politics in Colombia”, *The Guardian*, 26 August, 2008,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aug/26/colombia.sociology>, 浏览日期:2013年9月27日。

④ 迈尔斯·霍顿(Myles Horton)的生平及实践见Hale, Jon N. 2007. “Early Pedagogical Influences on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chools: Myles Horton and Cr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eep South American (1905-1990).” *American Education History Journal*, 34 (1-2), <http://www.pps.k12.or.us/schools/jefferson/files/nnewman1/earlypedagogical.html>, 浏览日期:2013年9月27日。

沙漠，有些生活在南方大城市；有些要面对在地的农耕问题，有些则要面对没法控制的主流市场；等等。所以，需要处理的语境是非常多样和复杂的，有些的确非我们所能控制，例如沙漠化、农业工业化科技化、农村不断被主流发展侵蚀、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城市生活的价值成为主流价值等，加上各个地方和个别妇女的状况都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覆盖面相当广但时间不长（三年）、资源投入相对有限的行动研究计划，或许不能解决各个点具体面对的问题，或得出很多可以量度的结果，然而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行动计划促成的在地变化和妇女们创造的可能性，这些变化与可能性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

另外，如前面提到的，生态、生计和文化的问题，是我们〔即被一般行动研究者称为“外来者”（outsider）的研究团队〕与“和平妇女”〔即被一般行动研究者称为“本地人”（insider）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参加者〕共同关注的。尽管我们不是生活在她们的社区，面对她们需要即时面对的问题，但我们没有把她们看成唯一的“问题的拥有者”，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人与人是互相依存的，例如，一处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地球上没有人能置身度外（“地球只有一个”）；农村传统价值崩溃，城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把协作（facilitate）个别妇女推动她们设定的行动计划和相关的资料记录和整理的工作，视为这项行动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跟“和平妇女”一样，都是行动的主体。究竟这些行动创造了什么新的知识、什么新的可能性，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二）行动研究是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

虽然行动研究不仅是“方法”，而且具有以实践改革社会的社会运动性质，但是作为研究的一种方式，它具有生产知识的功能和责任，并且有一定的程序和过程，所以跟任何研究一样，是“科学”的，而生产出来的知识也是可信的。根据格林伍德和列文的研究，“科学”说的的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涉及“问题的提出、操作方案的制订、假设的提出、资料的收集、资料的分析、行动设计、行动的执行、行动的评估以及提出新的假设、阐释和行动”，而行动研究所生产的知识，“是在行动和语境中得到验证的，这比依赖图书馆、资料库、身处研究情境外的专业研究者所进行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更能有效地满足科学方法的标准”。^① 他们更进一步界定“科学研究”为“一种能够发现世界是否按照我们的预设和预期而组织，并能提出实质的理解方式和行动方法的探究活动”，而“科学知识”是“一种经常处于过渡阶段的知识，不断寻找针

^①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p. 54.

对某些具体现象/过程的最佳认识与处理方式”。^①

这种强调科学的循环性、实用性、过渡性的理解，对应的是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保守见解，即把“科学”等同于“客观”“中立”，研究只能通过采用抽离的、实证的或量化的方法，才能获得“科学知识”，如果研究者没有将要研究的人或事对象化，使之成为“研究对象”，而是让他们参与其中的话，就是不科学的。格林伍德和列文指出，构成行动研究核心意义的是“参与”（这是“行动研究”、“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参与式研究”这三个名词在相关文献中是互通的原因），而“参与”是推动变革的基础，因为“参与”能体现民主价值和达到操控自身处境的目的，特别是在研究或知识生产这些领域。因此行动研究的设计，鼓励“本地人”或“利益相关者”参与原来是属于专业研究者负责的研究工作（例如田野观察、记录、资料分析等），作为“外来者”的专业研究者也需要参与“本地人”的具体行动，例如扮演协作者或导师的角色，甚至跟他们一起拟定工作议程，推进工作，并协助他们将在行动过程中生产的知识，应用到新一轮的行动中去，让知识更贴近实际需要，改变现状，科学研究同时也能循环不断地进行。^②

然而，正是这样的双向或合作性的参与模式，让行动研究不断受到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质疑或批评。这些精英分子不仅认为研究人员这样做不够“客观”“中立”，还怀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本地人”（尤其是被认为学识低的基层人士或边缘群体）是否能承担研究任务，这正是格林伍德和列文认为需要重新界定什么是“科学”，并指出行动研究才是更接近科学的探究活动的原因。不少例子证明，抽离研究情境的专业研究者所进行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很多时候提出不切实际的建议；相反，通过参与式的行动研究，才能得出可行的解决方案。^③

①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p. 56.

②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p. 7.

③ 三位曾经在坦桑尼亚南部进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女性研究员，分别跟一个农村和一个渔村的妇女一起解决了她们的生计问题。在总结经验时，她们指出，如果追随科学的教条做法，她们不会像从这些案例中那样，获得研究问题的所有知识：“在这些个案研究中，协作者和负责社区事务的政府官员运用他们基于经验和教育的一般知识；与此同时，人们拥有的特定知识也被提出来，系统化并得到应用。在这些情况下，互相学习十分重要。这些能促进行动的参与式分析过程，很多时候不被界定为研究活动，却包含行动研究的元素和设定。对我个人来说，这种与人们一起工作所提供的研究处境，比遵从科学的惯常规则，更能让我就所研究的问题获得全面的知识。”见 Swantz, Maria-Liisa, Ndedya, Elizabeth, and Masaiganah, Mwajuma Saiddy. 200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Southern Tanzan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omen.”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 395.

我们基本上认同格林伍德和列文对行动研究作为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的理解,并认为我们的行动研究是一个科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在我们的研究中,存在两个层次的知识生产循环:一是主要由两次行动研究工作坊(辅以中间的互访)带动的妇女之间的知识生产过程,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作为提出问题、设计行动、反思和评估行动、再提出新的问题和设计行动等的基础;另一是“和平妇女”在社区推动行动计划时所带动的个别知识生产过程,以具体解决问题或推动社区建设而进行的试验(如山西的沼液代替农药、云南的绿肥和堆肥)、问题评估(如云南和江西的“社区漫步”和讨论)或活动(江西的社区音乐工作坊、香港的社区厨房、徐兰香的“养生护土”交流与实践)为基础,中间也涉及问题的提出、行动的设计、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反思、评估,然后再提出问题、设计、行动等循环步骤。

此外,我们认为,和平的可持续性与知识生产息息相关。因此,对于研究团队来说,我们通过推动行动研究来生产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行为,更是一种和平行动。“和平妇女”中究竟多少人能够理解在本节开头介绍的行动研究理念,我们没有深究,但在实际执行中,我们看到“自己研究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要求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用文字、声音或影像记录自己的行动过程,以至总结及反思行动的结果,尤其困难。所以研究团队对“和平妇女”进行访谈,让大家可以通过交谈、对话,共同推进研究计划。正如格林伍德和列文所指出的,行动研究可以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或技巧进行,除了正规的访谈外,我们在参与推动和平行动计划的过程中与妇女所做的随意交流,也包含分析、总结、反思、再计划行动等研究元素。正如坦桑尼亚的行动研究者所说的:

这些能促进行动的参与式分析过程,很多时候不被界定为研究活动,却包含行动研究的元素和设定。^①

二 行动研究的认识论

在讨论了行动研究的两个前提后,这部分进一步介绍支撑行动研究作为变

^① Swantz, Maria-Liisa et al. 200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Southern Tanzan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omen."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edited by 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p. 395.

革和生产知识的方式的各种认识，以及这些认识背后的理论基础。这便是认识论的含义。

（一）变革或改变现状是如何发生的？

改变现状或解决问题是行动研究的目的，过程涉及如何认识现状或现实和理解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格林伍德和列文认为，现实是互相联系的（interconnected）、动态的（dynamic）、多变数的（multivariate）和“复杂得难以用现有理论和方法理解的”^①，这是行动研究的认识基础。因此，认识现实不能只通过知性的方式，学习现有的、抽象的知识，同时还需要通过实际的行动。这种实践性的认识行为，同时会带来改变，这正是行动研究更重视行动导向的知识的原因。格林伍德和列文有一个有趣的提法：“行动研究确认认识事物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全面、广泛以及合作的方式来改变它……”^② 意思是说，认识是改变的前提，但改变也是认识的关键。

格林伍德和列文这种打破知性与行动或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关系的认识论，背后主要有两套理论支撑。一是“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 GST），另一是“实用哲学”（Pragmatic Philosophy）。

一般系统理论源自科学领域。这套理论的核心是用整全（holistic）的角度看世界的生成——世界是不同的系统（物质的、社会的）和系统过程（system processes）相互碰撞而生成的。物质系统影响社会关系和过程，同时，社会活动改变物质世界。理解某种事物的唯一方法是将事物放回适当的系统语境中，并跟踪它发生变化的过程。一般系统理论之所以被认为跟行动研究相关，一方面是因为行动研究者力图将社会变为更开放的系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套理论认为，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运作的关键。将一般系统理论应用在行动研究中，个别行动者是各种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行为模式受制于这些系统的特质与动作过程，但这些系统也被行动者的行动所形塑。社会系统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处于不断运转的过程中，所以是动态的和历时性的。它们在特定的物质界限中运作，同时能够转化那些物质条件。^③ 所以行动者在改变社会系统的同时，也在改变物质系统，两者均是人类认知和生存的现实。

①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p. 54.

②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p. 54.

③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pp. 58 - 59.